

当代东南亚华人基督教浅析

朱 峰

内容提要：本文尝试概述当代东南亚华人基督教的形成背景，归纳其主要特点，分析其发展趋势。文章认为，东南亚华人基督教曾是西方对华传教工作的副产品，也是华侨华人在海外“落地生根”，社会现代化、价值多元化的结果。东南亚地区种族复杂，宗教多元。在多元异质文化的冲击交荡中，东南亚华人基督教呈现出与其它地区华人基督教相异的特点。当前，基督教在东南亚华人社会影响日增，但难以成为华人社会的主流文化，华文文化、华人佛教和伊斯兰教复兴力量则是影响东南亚华人基督教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东南亚 华人 基督教

作者简介：朱峰，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教授。

华人基督教是世界华人宗教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在海外华人基督教会中，东南亚华人基督教的规模最大，与中国教会来往非常密切。而在现代东南亚华人宗教信仰中，基督教的影响力也日渐增强，成为当地华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东南亚华人基督教还没有专门的研究。因此，本文尝试探讨现代东南亚华人基督教的形成背景、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国内学术界对东南亚华人宗教信仰的研究，希望能够抛砖引玉，促进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

一、形成背景

(一)西方对华传教活动和中国海外移民活动奠定了现代东南亚华人基督教的基础。1619年，基督教开始随着荷兰殖民者来到东南亚，并与当地华人接触。19世纪上半叶，基督教大规模进入东南亚华人社会，东南亚华人基督教由此产生。近代东南亚华人教会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813年首位东南亚华人入教到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结束，东南亚华人基督教主要是西方教会对华传教的“跳板”，有文字可考的入教华人共150余位。除了少数分散在广东、英国、美国外，大部分是马六甲、曼谷、新加坡、苏门答腊等地的东南亚华人。这一阶段，传教士在东南亚华人社会的活动主要目的是熟悉华人宗教信仰习惯，建立信徒网络，为入华传教做准备工作。第二阶段从1842年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阶段的东南亚华人基督教主要是服务大量南下的华侨移民。鸦片战争后，传教士正式进入中国传教，东南亚华人社会不再是入华传教的跳板。来自中国本土的移民成为东南亚华人教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福建、广东是近代中国移民的主要迁出地，这些移民按照原来方言群聚集形式，组建了许多闽南语教会、客家教会、潮语教会、粤语教会等等。广西宣道会在传教士的支持下还组织人员到东南亚传教，成立“中华国外布道团”。该团体在1929至1941年间共派出20名华人传教士，分散在荷属印度支那地区，包括新几内亚、苏门答腊、婆罗洲、巴利等地，先后建立了139个传教站。1941年，“中华国外布道团”在东南亚已发展了11,074名信徒。东南亚华人教会组织、附属机构初步成形。1900年，英属马来亚的卫理公会学校拥有1860名学生，1940年，学生数增加到17472人。^①这些工作奠定了现代东南亚华人基督教的基础。

^① Carl T. Smith, "A Register of Baptized Protestant Chinese, 1813-1842", *Chung Chi Bulletin* (Vol.49), pp.23-26.

(二)西方势力扶持东南亚华人教会,并向华人移交领导权。1949年之后,西方加强了对东南亚华人基督教的扶持力度,并逐步向华人信徒移交教会领导权,东南亚华人基督教发展进入现代阶段。首先,西方在华的传教力量在1949年后大量撤至东南亚地区。相应地,西方教会提出所谓“三个中国”理论,提出中国本土是“第一中国”;香港、台湾是“第二中国”;散布在东南亚的华人构成了“第三中国”,呼吁西方世界将此三个不同政治处境下华人社会视为一个整体,对东南亚华人的传教工作给予的支持,并等待重新进入中国内地的机会。1960-1964年,所谓“离散中的华人”(chinese in dispersion)成为美国卫理公会四年大会讨论的重点。全美教会差传教育委员会在1962至1963年度选择所谓“亚洲的边缘”作为工作重点,研究在东南亚华人地区进行传教工作。^①美国信义会把“中华福音储备基金”转用到东南亚的传教工作。第二,西方政治势力为“防范”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有意扶持华人基督教,间接促进了东南亚华人教会的发展。1960年代,东南亚反殖独立运动爆发。英国殖民当局为抵制马来亚共产党的发展,大量迁移原先散住乡村的华人进入所谓“新村”,实行所谓的“坚壁清野”。为配合这一政策,殖民当局邀请教会人士,特别是在华工作过的传教士到新村华人居民中传教,协助殖民者的统治。^②第三,为促进东南亚华人教会的成熟与发展,西方传教士逐渐向华人信徒移交教会领导权,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本地的教会。1948年,马来亚基督教理事会成立。1960年代,华人掌握了各宗派的领导权:1966年,周万一成为圣公会新马教区的第一位亚洲人大主教。1968年,叶金豪成为首位新加坡华人卫理公会会督。

(三)商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是现代东南亚华人教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随着工商业发展,东南亚华人社会现代化、城市化水平越来越高,教会发展的社会基础有所增强。根据社会调查,经济收入、教育程度、英文水平越高,信仰基督教的比例愈大。1980年的新加坡人口普查显示,尽管基督教徒、天主教徒的总数只占人口的10.3%,但在受过大专教育的人口中,却占了35.8%。有28%的专业人士和24.9%的行政人员自称为基督徒。在中学教师群体中,基督徒更占了35%的比例,成为最大的宗教群体。2000年,新加坡大学毕业生中有33.5%的人信仰基督教。在拥有私人住宅或别墅的人群中,基督教信仰者最多,达34.3%,道教信仰者只有4%。^③

(四)族群关系影响东南亚华人教会发展。在印度尼西亚,许多华人最初之所以加入基督教会,主要是因为紧张的族群关系。从1946年至1998年间,印度尼西亚排华事件不断发生,尤其是1965年“9.30事件”后,排华辱华事件更加严重。政府要求每个公民必须在身份证上填写宗教信仰一栏。许多华人一方面害怕没有宗教信仰被视为信仰共产主义者遭到政府迫害,另一方面又害怕信仰华人民间信仰遭到政府的压制。因为1967年的印度尼西亚政府总统令诬称“鉴于来源于其祖国的在印度尼西亚的支那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在其表现形式上对印度尼西亚公民足以造成心理、精神和道德上的不恰当的影响,以致成为同化进程的障碍。”^④由于基督教来自西方国家,印度尼西亚政府认为不会影响同化运动的进行,不阻挠华人入教,导致华人基督徒剧增。1985年,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基督徒数超过90万,约为华人人数的16%。在新加坡,政府坚守族群和谐、政教分离政策,2009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国庆日演讲上指出“新加坡社会最核心和危险的断裂点是种族和宗教。……基督教不能期望新

① Louis Robinson & Frank T. Cartwright, *Chinese Dispersion: Methodism's Role*, Board of Missions of the Methodist Church, pp. 7-12.

② 孙耀光:《在他手中:新加坡教会史(1819-1992)》,新加坡学生福音团契,1992年,第244页。

③ Choong Chee Pang, "Religious Composition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ome Comments on the Census 2000", Leo Suryadinata ed., *Ethnic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2002, pp. 329-330.

④ 周南京等编译:《印度尼西亚华人同化问题资料汇编》,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中心,1996年,第695页。

加坡成为基督教社会，穆斯林不能期望新加坡成为穆斯林社会，佛教、印度教和其它宗教团体都是如此”。李提到，一基督教福音派教会的团体在2009年4月为反对同性恋曾在短期内控制了某妇女组织，虽然他们很快被选举出局，但“这是宗教背景的团体试图进入公共空间，掌握他们不喜欢的非政府民间组织，贯彻他们的理念……这种行为会对不同宗教间的关系造成严重影响。”^①

二、主要特点

(一)发展情况受所在国主流文化影响。总的来看，基督教在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华人社会的发展可分为南洋群岛和中南半岛两个不同的区域，并因所在国主流文化不同而发展情况各异。

在南洋群岛各国，伊斯兰教势力较强，华人基督教发展比较迅速，华人基督徒人数也较多。1991年，马来西亚的华人宗教信仰类别中，有7.8%是基督教徒，在该国砂拉越、沙巴两州，更高达36.6%和27.2%。1980年，新加坡华人基督教徒有95847人，占华人人口6.3%，是华人的第三大宗教，加上第四位的天主教，信仰基督宗教比例达10.9%。1990年，这一比例增加到14.1%。^②

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华人基督徒最多的国家，基督徒占华人总数20%，仅次于佛教徒（30%）和孔教徒（24%），且人数还在不断增长之中。当地华人教会包括两类：一类是聚会仍使用华语或其它中国方言，如闽南语、客家话、粤语等的教会。这类教会多是中国的传道人及传教士帮助建立的，初期信徒是华人移民。1986年，全印度尼西亚约有400多间这样的教会，会友人数10多万名，其中加里曼岛49间、苏门答腊岛80间、爪哇岛260间、东印度尼西亚区25间；一类是只使用印度尼西亚语的华人教会，1986年这类教会约有5000多间，信徒80多万人，分布在50个基督教区会组织中。这类印度尼西亚语教会虽然也有少量印度尼西亚人参加，但华人色彩仍然非常明显。华人教会主办的神学院有三间，爪哇岛的东南亚圣道神学院、真道神学院；苏门答腊岛棉兰的卫理圣经学院。神学院全用印度尼西亚语授课。1985年，印度尼西亚华人教会所办的各类学校有4000多间。

在中南半岛各国，佛教文化昌盛，华人基督教发展速度比较缓慢。最为典型的是泰国华人基督教。泰国基督教徒约占总人口的0.5%。泰国政府认可的基督教团体包括泰国基督教总会、基督教联合会以及安息日会。泰国基督教总会是最大的基督教组织，由各宗派组成，全国分15个区会，信徒3万5千多人，其中第7区及第12区主要是华人教会。第7区教会以长老宗为主，有教堂17座，布道所等6个，会友2775人；第12区以浸礼宗为主，有教堂10座，布道所等10个，会友1786人。此外，宣道会、信义会、中华传道会、美南浸信会及一些独立教派也在泰国不同地区开展传教。^③1985年，泰国华人教堂及布道所有93间，其中泰北地区有36间，当地华人教会开办中文补习班，教导妇女家事知识和日常卫生医疗知识，为村民提供各种帮助。总的来看，基督教在佛教文化浓厚的中南半岛国家发展非常缓慢，泰国是少数没有限制传教士的东南亚国家，现有40多个外国传教组织，千余名传教士活动，但教会在泰国华人社会影响仍然很小，在社会慈善、医疗和教育等方面的影响远逊于传统华人社团。以美南浸信会为例，该会在泰国、香港开展传教工作。1960年，该会在泰国有42名传教士，香港有38名传教士，但10年之后，泰国美南浸信会只有355名信徒，而在香港已有12,527名信徒。^④

①《南华早报》（2009年8月18日）

② Choong Chee Pang, "Religious Composition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ome Comments on the Census 2000", Leo Suryadinata ed., *Ethnic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2002, pp.326-329.

③ 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部编：《当代华人教会》（第四册），香港基道书楼，1986年，第35-36页。

④ Carl E. Blandford, *Chinese Churches in Thailand*. Suriyaban Publishers, 1975, p.68.

(二) 教会机构是教会发挥社会影响的重要平台。二战前, 华人教会主要依赖学校扩大其社会影响。砂拉越诗巫的卫理公会兴办了49间教会学校, 新加坡圣公会兴办8间中小学, 新加坡卫理公会兴办11间学校。1900年到1940年间, 90%的新加坡卫理公会神职人员直接参与学校工作。二战后, 随着政府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与管理, 教会学校的社会影响力减弱, 对教会增长的贡献度有所下降。但普通信徒主导的教会机构逐渐成为推动教会增长的重要平台。20世纪50代福音机构大量建立, 70年代灵恩运动和小组教会模式开始流行, 动员大量普通信徒参与教会事务。这些教会机构无不强调“福音”传播, 信徒参与, 并有特定的活动范围和形式。第一类是以专业人士为对象的组织, 如基督徒教师团契、基督教医生与牙医团契、基督徒律师团契、基督徒商人团契。这类组织不只鼓励其会员向非信徒的同事传教, 也要求他们把信仰溶入专业工作中。为达到后者的目标, 他们时常举办研讨会, 发表文章, 针对一些课题提出基督教会看法, 如商业道德、堕胎、道德教育, 也时常会向政府陈述意见。第二类是以特定的活动为目标的基督教团体, 如国际基甸会的主要工作是把《圣经》放在所谓“策略性”地方, 如旅馆、军营、学校等。第三类是着重在会员集中地传教, 如在学生中开展传教工作的青年归主协会和校联团契。1986年, 仅在新加坡就有90间教会机构, 开展各项社会活动。2007年, 新加坡规模最大的七个慈善团体, 分别来自亚洲学园传道会、城市丰收教会、坚信浸信教会、光明山普觉禅寺、观音堂佛祖庙、新造教会、三一基督徒中心等7个宗教团体, 其中有五个是基督教团体。

(三) 语言差异是华人基督教多元化发展的重要因素。教会使用语言的差异导致东南亚华人教会内部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一是多语教会逐渐增加。1979年, 新加坡有单纯的华语教堂63间, 双语教会有99间, 其中华、英双语教会41间, 使用3种语言的教会有42间, 4种以上的有8间。二是教会内部出现隔阂与矛盾。由于不同年龄段的信徒采用不同语种进行教会崇拜仪式, 而不同语言的崇拜形式分别代表了不同文化的精神, 间接影响了教会信徒的思维方式, 导致教会内部年长一辈与年青一辈在处事方法、观念、情感表达与沟通方式上不协调, 在教会事务的处理上也引起一些冲突和磨擦。三是不同语言教会之间出现隔阂, 一些地方的英语教会与华语教会之间没有任何往来。教会人士反映, “参与华福西马区委会的教会中, 并不含有任何英语教会; 而马来西亚福音联合会也难以代表马来西亚的华语教会……英语教会与华语教会之间在马来西亚福音工作上也鲜有同步伐的策略与计划。”^①四是神学思想多元化。一般而言, 华语教会比较传统; 而讲英文或所在地官方语言的华裔教会较为西化, 受现代神学思想的影响较大。一位华文教会的领袖认为, “在东南亚的华人教会与中国文化是分不开的, 若强硬分开, 教会便失去了文化背景”。说华语(包括普通话、方言)的教会多数以福音派为主, 尤其是讲华语(包括华语方言)的教会受1920年代中国基要主义的影响较大。与此不同, 许多英文教会受现代神学思潮的影响较深。20世纪80、90年代, 不少英文教会受到韩国长老会赵镛基推动的“灵恩”运动影响, 纷纷提倡灵恩, 开展大型布道活动, 追求信徒的快速增长, 出现了新加坡坚信会、城市丰收教会等大型独立教会。

(四) 族群包容度较强, 传教意识非常浓厚。在东南亚, 基督教有较强的跨族群传播能力, 因为伊斯兰教基本上是马来人的宗教, 佛教、道教基本是华人的宗教, 印度教信徒多为印度人, 只有基督教、天主教是各宗教中唯一不是建立在种族基础上的宗教, 信仰者来自不同种族。根据1985年的统计, 新加坡112475名基督徒中, 各种族所占比例分别为: 华人85.2%, 马来人0.35%, 印度人5.13%, 欧洲人9.3%。显然, 华人占多数, 其它种族也占了一定比例。

信与传的结合是基督教的重要特点, 东南亚华人教会的传教意识尤为浓厚。1950年代, 中国内

① 麦希真:《华人教会面临的冲击和抉择》,《今日华人教会》,1980年1月,第6页。

地会到新加坡设立总部,改称为“海外基督使团”(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培训派遣传教士到东南亚各地华人教会。1960年,新加坡本地的对外传教机构“亚洲布道团契”成立。1970年代,新加坡教会开始向国外传教,1980年,新加坡布道与差传中心成立,1986年有44间教会从事对外传教工作,1991年的新加坡传教咨询会议又定出在2000年培养出500名以上长期在外的新加坡传教士。1992年,有12个国际传教中心进驻新加坡,321名新加坡本地人在海外43个国家或地区传教。^①在新加坡,随着人口老化,政府大力吸引来自中国的移民。据教会统计,移居新加坡的中国人有70万以上。2009年,新加坡教会提出“这群移居本地的华裔人士,可能就成为教会未来会友的源头”,要求向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传教。许多新加坡教会针对中国来的移民,组织所谓“中华团契”。^②

三、发展趋势

(一)基督教尚难以成为东南亚华人的主流文化。中国传统宗教信仰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尽管基督教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发展迅速,但从未成为华人主流宗教信仰,更难以进入当地华人的主流文化。在基督徒占较大比例的新加坡华人社会,一位教会知识份子抱怨,“在新加坡的文化界,基督徒是一个少数社会群体,也是一个异数。从文化主流定位看,基督徒文化人似乎本末倒置地反成为了‘外邦人’了;在一片非基督化的海洋中,基督徒文化人为免尴尬,大抵上都把自己的信仰掩盖得极为隐蔽。”^③一位闽南籍的马来西亚华人知识分子表示,“漳泉人祭祖求保佑,也是尊敬祖先。基督教称,信仰一个上帝,不能把祖先当作神来看。但我们觉得和祖先在精神上是一脉相通的。基督教常常说:我们的宗教和别的宗教不同,我们是喜悦的宗教,我不是用吓你的方式。但在很多时候,我听人传教时说,如果你不信,你会怎样,实际上还是一种恐惧。”“我跟传教人员接触时,他把一种想法放到你的身上,不会听你的意见。这时候,你会想到小时候祭祖,有其温馨的一面,不能把它当作迷信。”^④

(二)华文文化仍将对东南亚华人基督教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一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及中国文化影响力的增加,华语教会将会继续增长。二战后,华语教会一度受到巨大冲击。由于新加坡接受华文教育的小学生自1960年的43.5%降至1983年的6%,接受英语教育的小学生从49.5%增至93.9%。华文教会的成长率远远低于英文教会。许多教会在1950年代纷纷开始英语聚会。在1970年代,华文教会信徒人数的增长率约为29%,而英文教会信徒的增长率则为近66%。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华文文化和语言的复兴,华文教会逐渐重拾增长的动力。1986年,新加坡三一神学院主办了华文教会发展前景的专题研讨,设立探讨“福音与本地华族文化”的研究中心,尝试改变西化和中产形象。1980年代,新加坡华文教会保持了平均3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这一势头目前仍在持续。

二是传统方言群认同仍将是教会拓展网络的重要平台。方言群认同是海外华人的重要社会组成形式,也是近代东南亚华人基督教的主要构成形式。但在现代东南亚华人基督教会,普通话逐渐取代方言,普通话、英文教会增加。1971年,新加坡有34间教会使用普通话,有63间教会使用方言。1978年,使用方言的教会减少到44间,而单纯使用普通话或附有翻译的教会达到71间。^⑤总的来看,华人

① 孙耀光:《在他手中》,新加坡学生福音团契,1992年,第372-375页。

② 陈志彬:《吸引移民 基徒匹夫有责》<http://chinese.cac-singapore.org.sg/index.cfm?GPID=624>,2009年。

③ 《基督徒文化工作者的尴尬》<http://chinese.cac-singapore.org.sg/index.cfm?GPID=624>,2009年。

④ 2003年8月11日晚采访砂拉越华文协会谈话记录。

⑤ 孙耀光:《在他手中》,新加坡学生福音团契,1992年,第334-335页。

教会仍然重视方言在教会的作用。1986年,两个使用福州方言的教会共同举办“方言福音事工研讨会”。尽管有人认为,“方言被淘汰,是铁般的事实,”教会应该集中力量对政界、教育界和专业人士传教,因为“他们都是领导人物,政府对老百姓,教育界对学生,青年人,专业人员对所接触的群众,处处都能起很大的作用。”但多数人认为教会应多鼓励说方言,因为方言有其固有的影响力,在华人家庭生活的地位依然非常重要,带着归属、亲切、本源和契合的感情,是最有效力的传教工具。

(三) 华人佛教的复兴与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将是东南亚华人基督教的主要竞争对手。在华人社会内部,中国传统民间信仰、道教发展相对缓慢,但佛教发展迅速。一方面是佛教教义相对精致复杂,比较适应东南亚华人社会现代化趋势;另一方面,佛教的发展得到华人社团的大力支持。2001年,马来西亚华人宗教社团(含佛教、民间宗教)3351家,占全国同类型社团总数的62.27%。当地华人教会人士指出,“近年华团特别推动的佛教作为团结华人思想文化的宗教力量,鼓吹佛教的思想精神乃中华文化的导引,而宏扬佛教正是继承华人文化的主流,这个观念对华人教会传福音的拦阻比伊斯兰教的宗教影响更大,中国传统的佛道思想在华人中已根深蒂固,现时华团积极提高佛教徒地位,树立佛教新形象,标榜佛教的道德性,这些情况对福音的传扬、教会的发展实在造成极大的障碍。华人教会一直以来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福音及文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都甚少讨论,以致忽略其重要性。相反地,华团全力关注在整个华人社会的权益,在教育、文化、福利慈善等工作上,都比华人教会表现得更积极,华团的活跃无疑是华人教会的挑战和提醒。”^①以马来西亚砂拉越地区为例,当地佛教、基督教成为华人信众最多、增长最快的两种宗教信仰,而道教、孔教和民间宗教信仰的增长比较缓慢。下表是1981年至1991年的砂拉越地区华人宗教信仰变化表:^②

宗教类别	1981年信徒数	1991年信徒数	增长率
佛教	120247	167222	28%
孔教、道教、民间宗教	82290	95587	13%
基督教	84121	122148	31%
伊斯兰教	813	1917	57%
其它宗教	3245	763	-76%
无信仰	68996	57450	-16.7%

在华人社会外部,伊斯兰教复兴运动是影响基督教发展的重要因素。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在东南亚兴起。马来西亚政府大力推动伊斯兰教化政策,设立各类以伊斯兰教教义为营运原则的官方或半官方机构,如伊斯兰教大学、伊斯兰教银行、伊斯兰教保险等,规定公私立大专设伊斯兰教文明为必修课,安排国营电视台在每天的伊斯兰教徒祈祷时段播放可兰经经文的诵读、增加伊斯兰教节目。另外,在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徒妇女佩戴头巾,伊斯兰教徒排斥到非伊斯兰教徒经营的餐馆用餐,更极端的甚至排斥与非伊斯兰教徒同桌用膳。由于2010年初,马来西亚吉隆坡高等法院宣判天主教周报《先锋报》可使用“阿拉”字眼,引发不少伊斯兰教徒民间团体的抗议,导致不少华人教堂受到冲击。在雪兰莪、吉隆坡、马六甲及霹雳州、芙蓉等地有8间教会遭人纵火。这些现象对华人基督教的发展产生巨大冲击,值得特别留意。

(责任编辑 唐晓峰)

① 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部:《当代华人教会》(第三册),香港基道书楼,1986年,第100页。

②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of Malaysia, 1980: state population report Sarawak part*, Department of statistic, Malaysia, Kuala Lumpur, pp.227-228;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of Malaysia, 1991: state population report Sarawak part*, Department of statistic, Malaysia, Kuala Lumpur, pp.112-120.